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注重全局思维,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和博物馆建设提供系统性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

赋能、明责、共赢,突出强强联合、协同发力,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推进系统性保护,文物保护正在构建从单方主体责任走向部门协同、各尽其职、多元共创的开放生态。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聚焦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中心任务,注重全局思维,统筹谋划各项举措和工程项目,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和博物馆建设提供系统性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突出构建文化遗产工作的协作机制与作用彰显。

规划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规划要求提升保护水平,加强保护管理、落实保护前置、强化分类保护;加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力度、健全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监管体系;加强文物保护修缮管理,统筹推进抢救性、预防性、研究性保护。设置两个专项,强调“‘营造’重点计划”的工作脉络是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红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则要建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严格保护革命文物及周边历史环境。规划明确要深化考古和文明历史研究,在增量提质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同时,支持开展重大区域性、专题性考古项目;优化基本建设考古,有序开展国家重大工程和城乡建设考古工作,形成

发挥文物在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中的突出作用

陆 琼

稻花香里话古渠

温乐平

广信黄沙渠于2026年10月被列入第十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生态友好型水利工程的典型案例。

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黄沙岭乡,水源起于黄沙岭山脉,涉及5个行政村,汇入泸溪河,全长8.86公里,耕地灌溉面积万余亩,园地灌溉面积3000多亩,受益人口总数超2万。

黄沙渠前段是自然溪沟,在黄沙古道驿站处形成天池汇水,古代先人因地顺势修建了圳渠,与黄沙古道平行而下,故称之为黄沙渠。其始建年代不晚于宋代,完善于明清,是一座具有灌溉、蓄水、供水、防洪、排涝、生态涵养等综合功能的自流灌溉系统工程。

黄沙渠工程属于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陂塘,共1条主渠、24座堰坝、35条支渠及45处坑塘。这种多数量分布式陂塘蓄水工程的修建,适应山区耕地全覆盖的要求,避免了“高库大坝”在施工技术、工程材料等方面的高难度,降低了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工程结构的巧妙设计,是它的另一亮点。黄沙渠主渠过水断面宽度随汇水面积增加逐渐扩大,有利于区域防洪;挡墙下宽上窄,迎水面垂直,背水面倾斜,斜面上覆土压实,通过增加自重提升挡墙稳定性。水坡普遍低矮,能够消能卸洪,增强水坡整体稳定性。水坡顶部设计的木质多层叠梁门,是古人协调灌溉与防洪矛盾的智慧结晶:灌溉期,安装叠梁门抬高水位,满足灌溉需求;洪水期,拆卸叠梁门,形成更大的过水断面以便泄洪,同时不会破坏坝体本身。

工程就地取材,广泛采用条石、块石、卵石、方石等天然石材,材质环保耐久,与周边环境深度融合。梯级水坡布局、分散式坑塘调蓄、树枝状渠系串联、长藤结瓜式配置,形成了“坑塘—渠系—水坡—农田”体系,实现了水资源梯级调配、循环利用、高效节水,既充分发挥自然调蓄能力,又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占地与生态扰动。灌区耕地沿渠开发,逐渐向渠道四周蔓延。除沿程灌溉用水外,余水通过支渠仍流入黄沙主渠,下游陂堰再蓄水、再使用,实现了区域内农业灌溉的高效循环利用。

黄沙渠水利工程系统的出现,解决了山区丘陵地带灌溉难的问题,促进了当地的土地垦殖和农业生产。根据县志和族谱记载,唐代已有村民在黄沙岭乡居住和开发山区,两宋时余氏、龚氏、杨氏三大家族在此聚居。至明清时,徐氏、翁氏、舒氏等宗族不断迁居于此,人口越来越多。可以说,灌溉工程促进了当地传统村落的形成与繁荣。

800多年前,著名词人辛弃疾夜行黄沙古道,挥笔写下《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鹧鸪天·黄沙道中》等脍炙人口的诗词。“旧时茅店社林边”的茅店,正位于黄沙渠茅店上波段附近,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佳句,至今流传。

(作者单位:江西水利电力大学)



广信黄沙渠航拍图。 温乐平供图

发挥文物在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中的突出作用

陆 琼

据安全共享与动态维护机制。规划还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明确要求推进学科建设、优化专业设置,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推动文物保护装备研发与升级,加快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加强文物建筑、石窟寺、古壁画、岩画、土遗址等领域保护技术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无人机、实景三维、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提升数智化保护水平;加强保护人才培养,实施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文物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行动,特别强调要“壮大基层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

二是统筹构建大保护格局。规划锚定改革发展长远目标,突出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多措并举创新探索构建大保护格局。推动整体协同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协同保护、联动展陈,权责清晰、双向融合,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凸显空间保护的协同治理、联合管护与责任落实,强化空间规划管控,统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要求、完善规划编制标准等。在规划相关内容中确立多维度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多元协同赋能的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如对纳入国家文化公园挂牌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不仅支持其保护修缮工作,还将支持必要的博物馆建设等。构建安全监测预警指挥处置体系,健全文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制度;严厉打击文物犯罪,整治安全隐

十余万条卜辞里的“土方”追问

孙亚冰 刘 艺

更要紧的是,甲骨学家的许多判断,来自长期研读形成的“眼力”。资深研究者一看,就知道这里不能轻易当作地名,那里可能是方国称谓。可是,“一看就知道”的经验,后者很难复核、学习和传承。

转机出现在最古老的文字与最新的技术相遇之时。在腾讯“探元计划Next-Gen”的支持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高等研究院人工智能技术团队,与殷墟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协同开展研究。文博机构提出真实问题,甲骨学者把握学术尺度,技术人员则把读辞、核辞的过程写成一套能照着检查的方法。

题目很具体:卜辞里的一个名称,何时指人,何时指地,何时指方国?

这并不是把材料丢给机器,让机器直接给答案。第一步,是把专家经验写下来。“于某”“在某”有什么提示?“伐某”“征某”说明什么语境?带“方”的称谓,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作方国判断?哪些辞例支持,哪些反例提示不能照搬?专家与技术人员反复核对,把长期研读中积累的经验,整理成4类14条判据。每条判据都注明适用条件,列出支持辞例,也保留不能套用的反例。原本藏在个人“眼力”里的学问,开始有了别人可以翻查、质疑、改写的凭据。

有了判据,人工智能才真正派上用场。技术团队设置了多个分工明确的智能体:有的看语法,有的辨称谓,有的查战争语境,有的专门回查证据。它们调用专家“技能包”,检索释文,核对条件,记录辞例和出处。另一组智能体再来复核:引文能否支撑判断?判据是否用对了地方?有没有漏掉反例?机器做反复翻检和比对的苦工,学者得以把精力放回证据之间的关系。

上新了

安徽博物院蜀山馆。开馆前10分钟,东门入口处已经排起长队。在二楼“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厅入口处,一面巨大的屏幕上,屈原《天问》的诗句缓缓浮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安徽博物院、深空探测实验室承办,联动全国48家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历时近一年策划打磨,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文物大展。

以往的天文主题展览多聚焦天文科技成果,鲜少涉及中华文明宇宙观阐释。安徽博物院学术 research 部主任孟倩说,“我们想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是什么?中国人是怎么理解天的?这种‘认识’的方式又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文明?”

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引,沿“观天一度天—应天—巡天”主线,设“鸿蒙溯源 天问论道”“法天制器 万象制历”“敬授人时 众功皆兴”“文明以止 天人合一”“星耀古今 文明回响”五大单元,集中展出近300件文物展品。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王 丹

刘伯坚写给凤笙大嫂的绝笔信。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供图

大余梅岭,山势逶迤,林木苍郁。走进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大厅里那面破山而出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气势如虹。而在二楼的展柜中,一沓泛黄的信箋静静陈列,虽已跨越90余年,却依然让每一位驻足者心潮难平。

那是刘伯坚烈士的绝笔家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大余县地处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地带,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

刘伯坚,这位四川平昌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中共六大。长征出发之际,他奉命留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彼时的赣粤边,已是险境重重。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重兵“清剿”,严密的封锁隔绝了物资往来,游击队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络,深陷孤立无援的绝境。“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1936年陈毅写下的《赣南游击词》,真实记录下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1935年3月,刘伯坚在一次突围战中,不幸重伤被俘。在狱中,任凭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于生命最后时刻连续写下数封家书。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他在信中叮嘱家人不要设法营救:“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来营救我……我自己甘心忍受。”他还牵挂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虎、豹、熊,详细交代了孩子们的抚养去向。“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在给妻子王叔振的绝笔中,他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而彼时他并不知道,妻子王叔振已无法看到这封信——同年3月,她在闽西游击区牺牲。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面临的是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战争。在这三年里,瞿秋白坚守理想大义从容赴死;阮啸仙抱病指挥突围,中弹后仍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壮烈牺牲;贺昌身陷重围宁死不屈,以热血践行革命气节……他们用生命坚守的,正是刘伯坚笔下那句“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铮铮誓言。

南方游击战争覆盖赣、浙、闽、粤、鄂、豫、皖、湘8省15个游击区。这场浴血鏖战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保存了大量革命火种。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是全国首座全面展示这段光荣历史的红色基因库。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在诉说:长征是一条路,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刘伯坚的家书中凝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赤诚;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中升华为“靠人民,支援永不忘”的信念;在无数烈士的血肉之躯中化作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

信箋已然泛黄,但那字里行间的初心与信仰,必将如长征精神一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飞亚

在“天问”展,读懂中华文明的宇宙观

李俊杰

国家博物馆藏清代齐彦槐制天球仪,内部用发条驱动,能自动运转报时报刻。它制成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球面阴刻有黄道、星象、节候等信息,被齐彦槐称为“人间必不可少之器也”。这件清代仪器与“玉兔”号月球车模型同台展出,让观众看到中国人对“器”的理解一脉相承——工具不只是工具,它是人与天对话的媒介。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带刻划符号的陶碗、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猪纹斗形陶钵,这些看似和天文无关的文物,其实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猪纹斗形陶钵上小猪背部的圆形纹饰,很可能就是北斗七星之首“天枢”星。

为了让抽象的宇宙观变得可感,策展团队在观展体验上下了不少功夫。展览不仅使用了详细的图文展板解析天文知识,还运用动画视频、天文仪器实操演示、趣味知识图表来呈现展览信息。观众可以操作十二时辰与十二辰位转盘,理解时间与空间的对应关系,也可以在互动装置上留下踏上月球的脚印,感受登月的欣喜。围绕展览,安徽博物院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活动,涵盖学术讲座、研学营、文创市集等多个板块,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自己的“问天”入口。

“一个展览能做的,也许就是在5000年的问天之路,放一块小小的路标。让走过的人知道,这条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也不会在今天结束。”孟倩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斗形陶钵。 安徽博物院供图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斗形陶钵。 安徽博物院供图

这条主线蕴含着中国“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深刻表达。“问天”溯源中华文明对宇宙本源的探索,从古老的星象观测到深邃的哲学思辨,探寻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最初叩问与精神之源。“观天”“度天”呈现先民如何观测星象、制定历法,把对苍穹的认知转化为精密可循的时空秩序。“应天”阐释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宇宙观,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人文理想。“巡天”则是回应今日之问,发掘古老智慧的现代价值,让传统智慧与当代理想对话。

展览中最特别的设计,是打破古今藩篱、跨越时空的“对话”。金沙遗址出土的蛙形金箔、南阳市汉画馆藏嫦娥奔月画像石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月壤并置展出。一边是先民对于月亮的想象与认知,一边是当代中国人从月球背面取回的土壤。中间隔了两三千年,但我们对宇宙的探索一直没变。

类似的古今对话,贯穿整个展览。中国